

生态(社区)博物馆的中国经验与学术性 批判反思

潘守永

(中央民族大学 北京 100081)

内容提要:生态(社区)博物馆是新博物馆学理论指导下的一场博物馆运动,践行文化遗产的在地化、整体性与主体性保护,以兼容文化遗产保护与社会发展为使命。在国际范围内,生态(社区)博物馆仍然存在着争议,可视化生产与参观性使得博物馆社区成为“被参观的对象”,文化赋权被讥讽为“形式主义”。中国东部发达地区的“第三代”生态博物馆类型是否可以成为一种新的试验或方向?文化赋权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张力如何理解?所谓的“安吉模式”是“摊大饼”吗?这些问题和议题,需要给出学术性的批判与反思。

关键词:生态(社区)博物馆 遗产保护 社会发展 文化赋权

中图分类号:G260

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整体性保护与文化赋权之间的学术性张力

简而言之,生态博物馆(ecomuseum)就是将社区整体作为博物馆。新博物馆学的思想者们希望它能兼容保护与发展双重议题,将“博物馆”这个文化工具内化为社区的文化自觉,因此它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博物馆(living heritage museum),可以使传统的或“过时的”社区实现文化赋权(culture empowerment),激发文化的创造性力量。它的三个特性即文化遗产的在地化保护、整体性保护以及文化遗产保护与社区发展的统一,它们是三位一体的。这些新博物馆学(或社会博物馆学)的中心议题,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具体表述上或有微小的差异,其核心目标与中心思想是一致的,它反映了后工业社会人们对于生态环境和文化问题的忧虑与关切,它以对抗“精英文化宰制”的方式,不承认生态(社区)博物馆有某种模式,它是新博物馆运动的产物,也是新博物馆运动的载体^[1]。吊诡的是,它在世界各地的出现仍然是由“精英团体”(专家学者、思想家与官员)发起,又

是地方性意识崛起的一种文化表达^[2]。

从法国、意大利以及巴西等国的生态(社区)博物馆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化赋权、地方感(sense of place)以及历史感(sense of history)的产生也是三位一体的。在这些地方,生态(社区)博物馆建设对社区的文化遗产进行系统梳理,并在概念上进行提升,在资源意义上进行某些功能性的转化,挖掘以及唤醒本地人对于自身历史、文化与所在社区/社群的“生态”(自然的eco-以及生计的eco-)的新认识。无论是设置资料信息中心还是文化认知中心,博物馆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某种意义上它就是生态(社区)博物馆的小型“发动机”。

拥有历史(having history),究其实质是拥有历史的解释权,正如国际生态博物馆的重要准则“六枝原则”中所宣称的那样,村民是文化的拥有者。从生态(社区)博物馆的发展历程看,它的足迹似乎也属于全球化的一部分,但从其实现文化赋权的目的性要求看,它又是对抗全球化的重要工具^[3]。这的确是一个需要批判反思的吊诡议

收稿日期 2017-11-01

作者简介 潘守永(1966—),男,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与博物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文化人类学、新博物馆学、生态博物馆

©Nanjing Museum.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dnwh.njmuseum.com/>.

题。

挪威式的生态(社区)博物馆理论及其在贵州、广西的实践推广,所呈现的不是约翰·阿格·杰斯特龙(John Aage Gjestrum)的个人“文化英雄主义”,他对于第二类“生态”即生产生计的忽视,是一种更激进的新博物馆学姿态。但是,在中国西部以脱贫为己任的广大地区,它的确有一点“水土不服”。所有关于贵州生态博物馆“失败了”的言论,究其实质,无不是以生态(社区)博物馆是否给当地人带来具体的实际的经济收入为主臬的,生态(社区)博物馆最终效益的衡量标准恰恰不是“经济指数”而是“综合指标”。杰斯特龙倡导的挪威式的生态博物馆,在发展中国家给人造成某种错觉,就是生态(社区)博物馆不能搞“生产”,它不迎合旅游,不是景点,被解释成不欢迎游客。个别管理者对此过度解释,说这些博物馆主要不欢迎“低端游客”,将旅客分为高端和低端,用庸俗经济学的视角解释生态(社区)博物馆的主旨,于是管理上的疏忽给生态(社区)博物馆理念的传播造成进一步的伤害。第三代的浙江安吉生态博物馆类型,将生态和生计(生产)并置,践行以“文化为引领的新发展观”,以总体设计、整体推进的策略,走出了一条既符合中国实际,又能兼容当下与长远需求的道路。但是安吉生态博物馆群的“层级”设计即“中心馆+专题馆+展示点(馆)”,是否是中国城市化发展的一种“摊大饼”通病呢?对“生产”的关注是否会带来“文化赋权”的落空?生态(社区)博物馆建设是否会变成了经济(投资)项目而不是一项“文化工程”?

整体性的文化遗产观也是一个需要讨论的内容。所谓整体论有两层:一是立足于文化遗产的本体论,这是“世界遗产”概念扩大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原因;二是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要同时关注遗产地人们的现实需求。就文化的整体性而言,文化遗产的整体性认识中包含了文化整体性,即人类是由生物性的与文化性的两个部分共同构成,同时也强调了文化遗产是一个过程而非一个简单的结果。因此,生态(社区)博物馆的主旨不再是仅仅关注“物件”本身,而更主要的是呈现一种“文化过程”。

如所周知,生态博物馆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法国,当时乔治·亨利·里维埃(Georges Henri Rivi re)和雨果·戴瓦兰(Hugues de Varine)将环境保护的理念引入到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博物馆建设,把生态(ecological)和生计(economic)看作

有机整体,用动态的概念实现对一个社区整体的保护。从语源学上看,生态博物馆(ecomus e, eco-museum)是源于两个希腊语单词,一个是 iokos(英语eco,汉语“生态”),另一个是 museion(英语museum,汉语“博物馆”)。Iokos本意是指居住地,引申为人们在文化和历史方面适应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的全部内容。可见,将英语前缀eco用于生态博物馆,既不指经济(economy),也不泛指生态学(ecology),其本意是指社会生态环境均衡系统^[4]。从里维埃和戴瓦兰的解释中,其实我们还是不容易获得生态博物馆在法语语境中的真实意思。纳尔逊·格雷本(Nelson Graburn)在有关安吉生态博物馆的论述中说道,安吉的做法更接近于法国做法,重视两类“生”即“经济”(生计)和“生态学”(自然与人文的环境),用中国话说,生态博物馆是兼容“双生”(“生产”和“生态”)的一种文化工具,这样才容易理解戴瓦兰所提出的社会生态的均衡系统^[5]。

二、生态(社区)博物馆的中国实践与“代际”议题

苏东海先生认为,以贵州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为代表的贵州生态博物馆建设是中国生态博物馆的第一代,它们开启了中国生态博物馆的试验;而广西、云南及内蒙古等地的生态博物馆建设,特别是广西生态博物馆群的建设,则代表了中国生态博物馆的第二代。2000年,中挪等国学者依据贵州建立生态博物馆的实践经验提出了生态博物馆建设的“六枝原则”,获得国际学界的普遍认可。挪威的生态博物馆“模式”,不同于法国的生态博物馆形态,其对于旅游采取相对保守的做法。杰斯特龙在完成中国贵州的项目之后受邀到世界各地参与生态博物馆建设的指导,比如他后来在俄罗斯也同样传播这种“挪威式”的生态博物馆做法,即苏东海所概括的“社区+资料信息中心”以及“不主动接待旅游”的模式^[6]。“资料信息中心”被看作是此类生态博物馆的中心,它既是信息收集、保存中心,同时是展示中心、接待中心和研究工作站,也是村民活动的场所。因此,当地村民以及游客都把资料信息中心而非“整个社区”认定为“博物馆”。

显然,第一、二代生态博物馆基本不考虑游客的需求,不但没有服务于游客的相应设施、设备,也没有应对游客的策略,村民面对游客通常不知所措。“不鼓励游客”、“不主动接待游客”成为这些生态博物馆发展的一个座右铭,实际上也

制约了它们的发展。当地政府抱怨最多的是这些博物馆缺乏实际的经济效益。有学者甚至批评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实际成了一定意义的“文化代理”机构,成了政府的“花瓶”,当地人们并没有获得实际的益处,村民自然也就无法成为“六枝原则”里所说的“文化的拥有者”。不少慕名前来的记者、学者看到这样冷冷清清的局面后,认为生态博物馆在贵州的试验失败了^[7]。

一般认为,生态博物馆没有固定模式,它们各自都有其独特的经历和经验^[8]。此观点还强调了生态博物馆作为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固定的结果有其独特性和特殊价值所在。立足于整体性保护的生态(社区)博物馆与一般性的乡村博物馆之间,就其文化赋权而言,并不存在必然差别。普通形态的乡村博物馆也可以实现文化赋权的目的或结果,而不必把社区整体作为博物馆,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乡村博物馆具有突出的生态(社区)博物馆特征与意义,具有相同或相似的社会身份建构。生态(社区)博物馆与一般乡村博物馆除了外在特征的差别外(不一一赘述),主要存在社区区隔上的差别,以及由此造成的文化心理上的差别。在中国的具体语境中,两类博物馆的差别通常被描述为外在特征的差别,或者仅仅是名称上的区别,对于它们本质上的不同是不加以区分的。

文化部主推的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以及在云南省推行的民族文化生态村,与生态(社区)博物馆也是同一个概念。笔者有幸与胡朝相、刘铁梁、李松等参加了此项政策最初的概念设计。当时,民族与民间文化保护的问题已经凸显,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还没有出现,传统的文化工作难以涵盖这些任务,而且“文物系统”也难以包容这些新知识、新内容。所以,在2000年前后,我们借用生态博物馆、文化廊道等概念,创造了一个“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名词。现在看来,把文化生态保护区与生态(社区)博物馆人为加以区别,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对于贵州的生态博物馆试验以及广西“1+10”民族文化生态博物馆的推进工作,已经被很多的文章讨论过^[9]。对于贵州生态博物馆的积极意义,苏东海、安来顺以及杰斯特龙等高瞻远瞩,他们的意见既有理论高度更有现实关切。2005年在贵州召开的生态博物馆国际会议上,有关学者已经对中国的生态博物馆建设作了非常到位的总结^[10]。从人类学的角度看,学界要想厘清生态

博物馆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必须兼顾两个基本的视角,即历时性与共时性,而且要保证客位观察与主位解释能够互通^[11]。

苏东海先生认为,浙江安吉生态博物馆的实践代表了第三代生态博物馆类型,苏先生使用“代际”的叙述显然是呼应里维埃关于生态博物馆是一种“进化的”状态^[12]。在欧美的语境中,“进化的”等同于“进步的”,相对于传统博物馆的“静止状态”与举步不前,生态博物馆是新的希望。以浙江安吉生态博物馆为代表的第三代生态(社区)博物馆,虽然全面借鉴了贵州以及广西的生态博物馆经验,但在创立之初,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安吉生态博物馆作为项目建设,它符合中国语境中一切“规划现代化”项目的特征。安吉的生态博物馆规划一开始就受到各方的高度重视,当地民众的文化意识和自觉性也空前高涨,其“对话”能力也高于其他地方^[13]。笔者也曾撰文论述安吉生态博物馆群规划与建设的整个过程^[14]。

安吉县最终建成了一个覆盖全县域的博物馆群落,这个群落采用了多层级的结构,即1个中心馆、12个专题馆与多个村落文化展示点(馆)。专题馆和文化展示馆(点)均采用开放式的管理方式,截至2017年已经有14个专题博物馆,博物馆群进一步扩大,专题博物馆的类型也不仅仅限于生态(社区)博物馆,而是包容一切博物馆形态。从最初规划阶段主要围绕四类遗产(考古历史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军事一线路遗产和移民文化遗产)进行规划,到最终将全县域纳入生态博物馆的总体规划设计体系,将文化遗产转变成文化资源,将文化资源整合成一个地方的文化品牌,这一切都体现了生态(社区)博物馆建设是一种过程而非一个简单的结果。可贵的是,安吉生态博物馆的“顶层”设计也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有数次的试错,最终完成这个复杂结构的博物馆群建设,与最初的设想已经完全不同。安吉虽然并没有获得类似四川安仁“博物馆小镇”那样的名誉,但它实际上已经是中国最有博物馆色彩的县域。它与同时期在我国台湾建成的宜兰(兰阳)博物馆群落(1个兰阳博物馆+9个专题博物馆)有许多异曲同工之处,与韩国的“博物馆县”在组织结构、博物馆文化旨趣以及与当代民众的相容程度上具有同样的典范作用。

生态博物馆的“安吉模式”或称“第三代模式”,并非挑战生态博物馆没有模式可寻这个一般性的常识和看法,而是希望借用“模式”(也有

学者倾向于用“经验”或“范式”)来梳理以安吉生态博物馆群为代表的东部地区诸多生态(社区)博物馆建设的过程、经历、经验以及可能的理论意义。当我们强调生态博物馆没有固定模式时,我们所谓的模式是“照着做的标准样式”这一最基本的含义。“模式”作为“范式”时,则不必是“照着做”,而仅仅是制定策略时的“参照”。本文取用这个“参照”的意义阐释^[15]。

有学者主张,生态博物馆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北欧以斯堪森(Skansen)为代表的户外博物馆(open-air museum)实践,虽然斯堪森博物馆至今也没有使用生态博物馆(ecomuseum)这个名称^[16]。美国的普利茅斯农庄(Plymouth Plantation)、殖民地威廉斯堡(Colonial Williamsburg)以及阿米什社区(Amish Community and House)等社区博物馆,也都被视作具有生态博物馆的意义,其建立的时间也都早于法国。皮特·戴维斯(Peter Davis)所著《生态博物馆:地方之理性》对于生态博物馆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开展以及缘由有比较翔实的评述,指出生态博物馆有不同的传统,但法国则是生态博物馆思想的策源地^[17]。或许因为学者们囿于戴维斯式的认识,没有将20世纪80年代在贵州民族村寨里进行的户外博物馆(民族村寨博物馆)试验纳入生态(社区)博物馆范畴^[18]。今天看来这种说法是没有多少说服力的。特别是以贵州雷山县朗德上寨为代表的民族村寨博物馆,完全就是生态(社区)博物馆形态,只是其使用的名称上没有“生态”或“社区”的名号,也没有挪威模式的“资料信息中心”(information center),而忽视其在生态(社区)博物馆的探索意义,这是不妥当的。

三、生态(社区)博物馆的“门槛”与相关议题的学术批评

如果将朗德上寨博物馆也看作生态博物馆,那么是否所有具有乡村形态的博物馆都是生态博物馆呢?是否所有在城市社区的博物馆都是社区博物馆呢?如此,生态(社区)博物馆是否存在被异化的可能?生态(社区)博物馆的界限到底在哪里?这是特别需要做进一步辨析和讨论的议题。不久前,山东胶州某地做了一个博物馆群,自认为是超越安吉的“第四代生态博物馆”。经过对规划材料的分析和现场考察之后,我们发现那里只是一些旅游景点的组合,连普通形态的博物馆都算不上,更不要说生态(社区)博物馆了。一方面,生态(社区)博物馆在中国的发展面临诸多困难,所以国家才启动全国生态博物馆示范项目予

以支持;另一方面生态(社区)博物馆被泛化的现象此起彼伏,以为只要挂上生态(社区)博物馆的牌子就是生态(社区)博物馆了。

三十年前英文ecomuseum被译成中文的“生态博物馆”,这是一个新鲜而又陌生的词汇。经过贵州、广西、浙江、安徽等地的具体实践之后,生态博物馆理念得到比较广泛的认同。这也得益于苏东海和安来顺两位学者对生态博物馆概念的传播与普及所做的大量工作^[19]。但是很多国内的学人对于生态博物馆内涵、外延以及世界各国所进行的实践探索所知不多,甚至将生态博物馆理解为“生态保护区”之类的机构,认识上存在的差异也比较大。有学者甚至主张,英文中的ecomuseum应该按照实际意思翻译为“社区/社群博物馆”,因为中文的生态博物馆一词容易望文生义,理解为纯粹自然保护区或植物园一类的机构。拉美地区的博物馆学者在其提出的“社会博物馆学”(sociomuseology)理论框架中,将生态博物馆、社区博物馆、露天博物馆、邻里博物馆等,都看作是同一种形态,属于新博物馆学或社会博物馆学理论体系之下的融合社区发展与博物馆为一体的新型博物馆。名称之别说明了不同的地区性实践经验之差异^[20]。

生态博物馆作为一种文化工具,在保护传统村落、传统城市社区方面的积极作用,业内已经取得广泛的共识。但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生态博物馆是作为一个社会运动而不是规划现代化的投资工具得以开展起来的,它不纯粹是一个专业领域的学术活动。在国际博物馆学界,生态博物馆实践探索被认为是新博物馆学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1984年戴瓦兰亲自起草的《魁北克宣言》就对生态(社区)博物馆思想进行了深刻总结,这份文件自然是这个新博物馆学运动组织化的起点^[21]。在拉美国家,社会博物馆学被认为是博物馆学旗帜最鲜明的一场运动,是博物馆学新发展的一个最有说服力的标志和方向^[22]。

2000年贵州生态博物馆国际会议通过的“六枝原则”是国际生态博物馆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重要产物,应该被看作是《魁北克宣言》的持续。只要依照“六枝原则”的九个条款来对比前述自称为生态(社区)博物馆的事项,其是否为生态(社区)博物馆一目了然。那种把生态(社区)博物馆名词当时髦而忽视其本质诉求的做法,正在蚕食生态(社区)博物馆的资源和社会认同,是对当代博物馆发展的挑衅,必须加以厘清和隔离。

生态(社区)博物馆与传统博物馆相比较,具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但这并不等于生态(社区)博物馆没有基本的门槛。从博物馆自身历史发展看,生态(社区)博物馆的先进思想,对传统博物馆的“专业性”与“职业化”构成挑战,对当代博物馆学产生了革命性的重要影响。传统博物馆以藏品而知名,其工作围绕藏品开展,具有典型的“自我循环”的特征。生态博物馆强调与社区的融合,强调“普通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平等价值,主张博物馆应积极参与到解决社会问题之中,对社区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博物馆不是储藏室,是社会发展的镜子,也是多元文化展示和观点交流的平台。它强调人而不再仅仅强调物,重视人而不再仅仅重视物件,从生态(社区)博物馆的实践中,传统博物馆也获得新的启示。策展人(Curator)制度更具包容性,不少博物馆除了围绕藏品设置 curator 职位外,还设置了诸如教育主管(education curator)岗位。

“人”的因素,也就是“六枝原则”中村民(居民)的地位,是判断一个机构是否是生态(社区)博物馆的核心标准。一个旅游景点,村民(居民)处于“被展示”和被观看的地位是常态的,实际上这些景点已经完全没有居民,所谓居民只是回来“上班”的少数人。在自己的老房子里重新做一天“村民”,也许会唤醒这些村民的文化怀旧意识,但无法达到“文化自觉”的目的,这才是一般乡村旅游景点、民宿等与生态(社区)博物馆根本区别。所谓的“乡愁”与文化自觉相比,在文化赋权层面具有本质差异。当然,对“人”自身的重视,还包括了“志愿者”这个特殊的角色。无论是传统博物馆还是生态(社区)博物馆,都在大力招募志愿者,经济条件好的年轻人包括成功人士,都需要价值观吻合的族群和平台。志愿者是宝贵财富,是最好的传播者。把握“价值观”非卖品,是文化项目的关键。对待底层务工者,不是给他们更多的工资,而是从系统设计开始,就要把他们放在被尊重的位置上。比如工艺要尽力减少带有奴役性的做法安排,推动劳动者人机结合,把劳动作为培训和引导知识进步的社会手段。在工程流程的安排上,把人的生理心理节律看成工程品质的一部分,使人在工程中的表现与最终结果统一在同一个能指的观念上。这虽然是另外的议题,但与生态(社区)博物馆的联系极为密切。生态(社区)博物馆因为是围绕“人—社会—生态环境”一体化开展工作,居民以及外来游客被放置一个

“并置”的位置,因此在处理“人”的议题上,生态(社区)博物馆具有更成功的经验。

综上,如果忽视生态(社区)博物馆的基本条件,把博物馆的“代际”泛化是值得警惕的新现象。

四、生态(社区)博物馆在中国的未来

以社区为中心、把遗产留在当地,这是生态博物馆的两个核心,也是当前在中国广泛开展的“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的主题曲。在前后共五批的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中,采用了“博物馆”形态作为保护利用模式的不足百分之一。这是由于生态(社区)博物馆过于奢侈还是另有原因?生态(社区)博物馆在中国毕竟已经有二十年的引进、建设与发展历程。

20世纪80年代中期,“生态博物馆”通过《中国博物馆》杂志被翻译介绍到中国^[23],那时并没有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当时整个中国博物馆事业还处在百废待兴的“恢复期”,一般知识和思想界均认定20世纪80年代存在过一个文化热的时期,但此“文化热”对于博物馆似乎没有产生思想和知识的启蒙,或者说博物馆的恢复和再出发与“文化热”是两条并行的平行线。按照苏东海先生的说法,中国博物馆学的理论指南一直是自20世纪50年代依托苏联博物馆学理论建立起来的中国特色理论,这个博物馆学理论的核心是“三性二务”,其与当代国际新博物馆学的理论显然是可以兼容的^[24]。

大家热衷于讨论20世纪90年代以后博物馆学理论的缺失或迷失,其背景则是国际博物馆学的理论新进展与中国国内博物馆实践之间存在巨大张力。生态博物馆在中国的实践,则被认为是一个例外。但其社会动员能力和社会影响力则相当有限,无论贵州、广西还是云南、内蒙古,都是少数民族集中的地区,在这些地方建设的生态博物馆被理解为少数民族地区村寨更适合建设生态博物馆。但吴正光等人在吕济民等人的支持下所建成民族村寨主题博物馆,并没有被纳入到贵州“生态博物馆”序列^[25],何也?

广西生态博物馆群的“1+10”工程,也没有将广西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非遗”创意,如实景演出、山水旅游等纳入其中,反而非常注意生态博物馆与它们的区别而不是联系,似乎也说明了在生态(社区)博物馆建设的初期,博物馆界的自我“界限”是很明显,这当然也反映了中国体制的因素^[26]。至于云南在生态博物馆建设中,使用“民族

文化生态村”而非“生态博物馆”的名称,也似乎说明了生态博物馆的中国团队在学术思想上的不成熟性。试着思考一下,为什么法国以及英国的生态博物馆形态没有进入到中国?这显然是一个无法给出确切答案的问题。的确,无论是法国形态的生态博物馆还是英国形态的生态博物馆,均将工业遗产(群)作为主要目标和重点。进入21世纪,国家重点支持的首批五家全国生态(社区)博物馆示范点,有了更大的包容性,但这个项目在第一期之后却戛然而止^[27]。

同样,始于21世纪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实践,在舆论动员、知识传播与普及以及保护传承技术的探索等方面,都是前所未有的尝试,这是新的生态博物馆建设的技术保障和基础,这些在三十年前的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但这些工作也没有很好地与生态(社区)博物馆结合起来。于是,出现了前述“文化生态保护区”与“生态博物馆”并存的奇怪现象。

如此,生态(社区)博物馆在中国还有未来吗?笔者因为参与安吉生态博物馆规划与建设的大部分过程,也许能够从安吉的经验与做法中,就这个话题谈一些认识和见解:生态博物馆在中国有光明的未来!

安吉进行生态博物馆探索时中国的生态博物馆发展并不好。有人说安吉发展生态博物馆是偶然。开始阶段一些学者以及安吉县政府曾经建议使用“中国生态博物馆”来凸显“中国文化符号”。但生态博物馆的命名原则之一是“小地名”原则,所以冠名“中国”并不理想。安吉生态博物馆群建设中包括了某些“试错”的成分,这可能与其他生态博物馆不同。

安吉生态博物馆的定位具有借鉴意义。安吉确立“生态立县”的宏伟目标,确定要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城乡统筹发展。笔者认为,这是生态博物馆“安吉模式”中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如果生态博物馆的建设忽视了这个事实,则很难进行下去。目前中国推进的新农村建设方略,融合了多个学科、众多专家的智慧,对中国现状的剖析以及对未来走向的分析,是生态博物馆设计必须参照的系统性资源^[28]。

生态博物馆不回避旅游。2013年在第23届国际博物馆协会大会(巴西)上,国际新博物馆学运动小组的讨论主题就是生态博物馆如何利用旅游。安吉生态博物馆突出旅游的价值与本地已经成长起来的农家乐旅游密切相关。安吉生态博物

馆定位为一个开放的系统,“中心馆(暨资料信息中心)—专题展示馆—村落文化展示馆(点)”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系统。考评委员会会根据规模面积、主题是否与生态博物馆主旨、体系相符合,以及未来发展的可能性等,认定其是否进入生态博物馆系统^[29]。

五、余论

遗产工作的核心是价值保护。生态博物馆所倡导的文化整体论、文化保护与发展动态观,符合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的主旨。前述中国各地、世界各地的生态博物馆实践,都是在面临保护与发展如何协调统一这一难题时的共同选择。

生态博物馆作为文化工具,也是创意、创新的工具。也许未来人们不再需要生态博物馆的时候,生态博物馆会被视为传统博物馆。或许我们可以思考一下中国二十年的生态博物馆实践,对博物馆学建设的意义在哪里?

[1][20][22] Paula Assuncao, Judite Primo eds. *Sociomuseology Series 4: To Think Sociomuseologically*. Museo-logy Department. ULHT, 2013.

[2] 安来顺:《一种以社区为核心的开放型博物馆——国际生态博物馆40年探索》,《中国文化遗产》2011年第6期;潘守永:《生态博物馆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历时性观察与思考》,《中国博物馆》2011年第Z1期。

[3][17] Peter Davis. *Ecomuseum: A Sense of Place*.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2011.

[4][法]乔治·亨利·里维埃著、孟庆龙译:《生态博物馆——一个进化的定义》,《中国博物馆》1986年第4期;[法]雨果·戴瓦兰著、张晋平译:《二十世纪60—70年代新博物馆运动思想和“生态博物馆”用词和概念的起源》,中国博物馆学会编《2005年贵州生态博物馆国际论坛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

[5] Nelson Graburn. Anji Ecomuseum: Growing up! 《科学教育与博物馆》2014年第2期。

[6] 苏东海:《中国生态博物馆的道路》,《博物馆沉思(三)》,文物出版社2010年。

[7] 毛俊玉:《生态博物馆只是一种理念,而非一种固定的模式——对话潘守永》,《文化月刊》2011年第10期。

[8][法]乔治·亨利·里维埃著、孟庆龙译:《生态博物馆——一个进化的定义》,《中国博物馆》1986年第4期。

[9][26] 覃浦主编:《守望家园:广西民族博物馆与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1+10建设工程文集》,广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

[10] 中国博物馆学会编:《2005年贵州生态博物馆国际论坛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

- [11]潘守永:《生态博物馆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历时性观察与思考》,《中国博物馆》2011年第Z1期;William Nitzky. Community Empowerment at the Periphery? Participatory Approaches to Heritage Protection in Guizhou, China. In Blumenfeld, Tami & Helaine. *Cultural Heritage Politics in China*. New York: Springer, 2013.
- [12][19]安来顺:《国际生态博物馆40年:发展与问题》,《中国博物馆》2011年第Z1期。
- [13]单霁翔:《安吉生态博物馆建设的核心理念》,《今日浙江》2011年第2期。
- [14][29]潘守永:《“第三代”生态博物馆与安吉生态博物馆群建设的理论思考》,《东南文化》2013年第6期。
- [15]Christopher Alexander, Sara Ishikawa & Murray Silverstein. *A Pattern Language: Towns, Buildings, Constr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Alexander给出的经典定义是:每个模式都描述了一个在我们的环境中不断出现的问题,然后描述了该问题的解决方案的核心,通过这种方式,你可以无数次地使用那些已有的解决方案,无需在重复相同的工作。同时,模式“是一种参照性指导方略”。显然,模式的含义是相当复杂的。
- [16]此馆建立于1891年,移植了瑞典全国范围内160多座农舍聚合而成,建筑虽然是传统的“原物”,但却是“移植”来的,脱离了原来的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故不被认为是严格意义上的生态博物馆。
- [18]吕济民:《贵州博物馆的启示》,《中国博物馆史论》,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吴正光:《朗德苗寨博物馆》,文物出版社2007年。
- [21]1983年5月26日戴瓦兰等起草了《生态博物馆魁北克宣言》(*Ecomuseum Declaration of Quebec*),1984年被修订为《魁北克宣言》(*Quebec Declaration*)。
- [23]安来顺:《一种以社区为核心的开放型博物馆——国际生态博物馆40年探索》,《中国文化遗产》2011年第6期;苏东海:《中国生态博物馆的道路》,《博物馆沉思(三)》,文物出版社2010年。
- [24]苏东海:《新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1949—2005》,《中国文化遗产》2005年第4期。
- [25]胡朝相:《贵州生态博物馆纪实》,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年。
- [27]单霁翔:《发展生态(社区)博物馆,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全国生态(社区)博物馆研讨会主旨发言,福州2011年8月。
- [28]程亦胜:《安吉建设生态博物馆的实践和思考》,《中国文物报》2013年2月20日第6版。

The Ecomuseum (Community Museum): Chinese Experiences and Critical Discussions

PAN Shou-yong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The ecomuseum (community museum) is a museum movement guided by the new museology that is practiced focusing on the in-situ, integral, and locally participative approach to heritage preservation with a dual mission of heritage preservation and social development. Worldwide the ecomuseum (community museum) is still a controversial matter in that visual production and allowing visitation make the community “an object being watched”; cultural empowerment of local people is satirized as a product of formalism. Could “the third generation of ecomuseums” practiced in the more developed eastern regions of China be a new experiment or a model to follow? How to understand the tension between cultural empowerment and economic benefits? Is the Anji-Model an alternative to urban sprawl? These questions and issues remain to receive critical discussions and reflections.

Key words: the ecomuseum (community museum); heritage preservation; social development; cultural empowerment

(责任编辑:黄 洋;校对:徐秀丽)